

中國經濟原論

新中國大學叢書
王亞南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發行



書叢學大國中

論原濟經國中

著南亞王

知新·書讀·活生

店書聯三



5 · 1D5 · 23K · P294 · \$13.6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五月第一版

國光印書局承印

上海造00001—10000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漢口

解放後新版序言

本書第一版，係於抗戰剛結束的一九四六年一月，由中國經濟科學出版社在福建發行。新版於一九四七年七月改由上海生活書店印行。那個新版在內容上雖然有些增刪改變，但它研究對象，仍止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形態。這樣性質的一部書，在前此引起大家對於舊經濟的基本認識上，雖曾盡過些許啓蒙作用，但到現階段，到中國整個經濟，已在或急或徐的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着新民主主義轉形變質的現階段，它是否還值得重新印出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是一再向自己提出過，並且還不時向着關心本書命運的朋友們談過。認為值得再印出來的意見是大家一致的，但對於爲什麼值得再印出來的理由或看法，就有些不同了。看近一點，或者看得實際一點，是以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統治時代雖然過去了，但中國之大，全國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在相當時期內，我們還是需要對舊經濟有所理解的；但也還有從歷史觀點來看，以爲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這一段苦痛的社會經濟史，今後假使人力物力許可，還需要我們費更多點氣力去鑽研它；而且，愈是要好好理解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在中國現代社會發展史上的必然性，愈是要好好評價它的創建者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提出這種主義來的天才預見性與獨創性，也許就愈需要對中國舊經濟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加以明確的科學的解析。我不敢說本書在這些方面究竟是否有一點助益，但在我自己看來，覺得這本書至少是響應當時學術中國化，響應當時新啓蒙運動的一個鮮明記錄。在今日或在今後，有誰要觸到學術中國化，特別是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歷史，本書至少也許可以多多少少暗示出那該是怎樣一

個經歷了多少摸索和「嘗試錯誤」的艱難過程。

不過，對於這樣一種著作物，把它放擱下來，雖然感到不無可取之處，但要把它重印出來，却又不能不去檢點它的缺憾了。我會計劃把它改造一下，作爲一個改造版。就是把本論八篇中的第一篇，改寫成爲總導論，加寫第一篇，敘述舊經濟的輪廓；由第一篇至第八篇，合成上卷，作爲舊經濟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研究。另寫一個下卷，作爲新經濟或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研究，其內容是：

(一) 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到新民主主義經濟；

(二) 舊社會生產關係與土地改革過程中顯示的諸規律；

(三) 三大經濟綱領與社會勞動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

(四) 新經濟的構成與性質；

(五) 新經濟的諸範疇，其法則及其作用；

(六) 走向社會主義經濟之路；

還加上一篇附錄：馬列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形態。

我不但這樣計劃着，並還動手寫了。在寫作過程中，我已有些感到這個下卷的體裁和章法，和上卷有些不大調和。上卷是把已經形成的舊經濟，作爲分析對象，下卷則大體是把將待形成的新經濟作爲推論對象；前者重在法則或規律的把握，後者則止於原則的說明。所以愈寫到快要完結的時候，我就愈懷疑把兩者合在一起是否妥當。經過再三考慮，還是覺得讓這樣研究舊經濟的舊書，維持它本來的面目好。但一個舊著作臨到新時代，它的缺點和不够的地方，它的時代傷疤，是需要好好揭露出來，才不致引起不良的影響的。

依我此刻所能理解到的本書缺點或傷疤，最需要予以批判揭露的，約有以次三點：其一是在第一篇中國經濟研究總論中，關於

中國經濟研究的諸階段，講得不够明確，有的地方，甚且是故意將其弄得隱晦不全的。這是當時環境不允許清楚明白的講出來的原故；其二是，全書對各種經濟形態，分別作着科學的分析以前，應在第一篇總論中，將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全輪廓，它的歷史，它的特點，扼要敘述出來，以爲後面立論的張本；我沒有這樣做，這決不能推諉是環境不許可，而是由於我自己處理題材，把握問題，沒有牢固嚴密的掌握着馬列主義的「從事實出發」的方法論；其三是，關於中國經濟往何處去的問題，我只是從消極方面指出了必須破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產關係，社會勞動生產力才得發展的這一面，這雖然是本書研究的重要結論，但究竟應採取如何的變革方式才能破除生產關係，才能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我不但不會講得明白，且實在也理解得頗不透澈，這與其說是關係學力的問題，毋寧說是關係研究方式的問題，關係於理論不會好好與實際結合的問題。

我現在想分別就這三方面來加以補充，加以自我批判的解說，希望能藉此稍微補救本書中所存在的一些基本缺點。

二

先講關於中國經濟研究諸階段的說明。

在本書第一篇總論的開頭一段，對於正式把中國經濟當作研究對象來提起，正式觸及中國經濟的性質問題，我表示是「從客觀方面講，大體是得力於以次兩點：即我們實踐上的緊迫要求和當代世界現實明確呈現了一部社會發展史的圖樣，而後一方面發展的總傾向，又顯然是直接間接會在前一方面發生敦促作用的。」這段話在當時的暗示性，雖然相當明白，在今天看，就太不透澈了。而且緊接着提到的三個研究階段的研究成果，對於中國革命領導者及其他革命理論家們的有關的認識和科學說明，却半因得不到材料，半因怕觸到忌諱而付之缺如了。

這在今天是需要將它明朗化，將它講個明白的。

中國現代經濟性質問題研究，實則是起於中國革命實踐上的緊迫要求，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出現；後者的出現，不僅使當代世界明確呈現出了一部社會發展史的畫圖，而且由它顯示的資本主義經濟由其內在發展規律必然依革命鬥爭推向社會主義的總動向，不僅對中國革命實踐發生了極大的敦促作用，同時，由於蘇聯特別關懷中國革命實踐，特別要求了解中國社會性質，因而也直接間接推動了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科學的研究。

我們不應忘記，蘇聯在建國後不久，特別在列寧逝世的當時，由斯大林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與托派間的政治的思想的鬥爭，即在中國問題上，在中國社會性質認識的分歧點上，也已經非常尖銳化明朗化了。依托派，中國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佔着支配地位；但依布爾塞維克黨，中國社會尙是封建的生產方式佔着支配地位。這兩個正相對立的見解，不僅反映在中國革命實踐上，在理論被當作是革命實踐的一個生動的重要的部分的限內，也同樣如實的反映在中國社會經濟性質的論究上。就因為這個緣故，中國較近二三十年來的經濟研究，就不但與中國革命實踐保持極密切的關聯，同時也同蘇聯論壇上對於中國社會性質革命性質的認識，有了頗不易機械斷分的聯繫。

還必得指出，對於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性質的論究，任何高明的資產學者，都是感到生疏的，在他們的庸俗的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中，只有量的進化的觀念，所以在近幾十年的中國經濟的科學研究上，或在中國社會經濟性質的論戰上，他們是只能以超然的姿態站在一邊旁觀的。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一點看法，他們是消極的，默然的，不自覺的站在中國托派的那個觀念上，即他們殆近於先天的把中國社會看成資本主義社會。他們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看法和處理方法，除了在某種場合，也提到一些含糊籠統的「落後」或「技術低下」的術語外，一直是毫無保留的把中國社會看成資本主義社會的。也許就因了這個緣故，當革命的現實，使托派的理論在蘇聯破產，在中國也根本被證實為毫無出息的時候，中國買辦官僚的統治者，却像很聰明的有意識的把它當作「奇貨可居」了。

因此，在近幾十年來的中國經濟研究上，始終存在着兩個對立的陣營，一是認定中國社會在基本上仍是受着封建生產方法支配，一是認定中國社會已經資本主義化了。中國共產黨與各種進步的學術研究團體或個人，站在前一陣營方面，中國的托派與買辦資產學者，站在後一陣營方面。無論在我本書論及的諸研究階段的那一階段，這兩個對立的陣營對立的見解，是壁壘分明的。不過緊密的聯繫着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消長，中國經濟研究上也明確反映出了科學的高揚與反科學的沒落的起伏變化。

至若我在所述諸研究階段中，半因材料缺乏，半因迴避忌諱所沒有明白提到革命陣營方面，特別是共產黨方面的研究成果，今日任誰都是可在許多有關共產黨的鬥爭策略的文獻中，在毛主席的各種調查報告及革命指導論著中，在許多優秀經濟學者如陳伯達許滌新先生等的各種有關著作中，充分見到的。事實上，無論在近幾十年來的那一個中國經濟研究階段，主要的都是由中國共產黨澈底的堅持着中國經濟之半封建半殖民地這一觀點和立場。特關於此點，在下面還有補充說明的機會。

三

接着，我要講到這一點，即本書在整個結構上，不會先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實況與特質，全面的繪出一個輪廓，是一個方法論上的缺憾這一點。

關於這個缺憾，我原來打算把第一篇當作總導論或緒論，另寫第一篇來補救的。現在既然把原書當作一個舊著作來維持它本來面目，只好在這裏補說一個梗概了。

中國社會經濟原來是怎樣的呢？它是怎樣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呢？它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狀況又是怎樣的呢？當作中國舊經濟研究的出發點，這幾個問題是必須回答的。我們以往有不少關於這些方面的說明和論著，如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經濟史……等，就在我自己，也會在有關的場合，嘗試依據史實，把這個過程敘述出來。但我們大家的努力，怎麼也不能像毛主席在一九三

九年公刊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論著中所敘述的那樣，用精鍊有力的「血與火的文句」把中國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全過程、面貌和本質，給鮮明的顯現出來。在這裏，我想依據那個論著中的第三節（選集第二〇九——二一三頁）對中國舊經濟描出一個輪廓。

三千年來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封建社會。中國封建時代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各個主要特點構成的。

（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主要地位。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份的手工業品。農民交付地主貴族的地租，也主要是由地主們自己享用，不是爲了交換。那時雖有交換的發展，但在整個經濟中不起決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統治階級——地主、貴族以至皇帝，他們擁有最大部份的土地，而在農民則很少土地，或完全沒有土地。農民用自己的簡陋工具去耕種地主、貴族和皇帝的土地，並將收穫的四成、五成、六成甚至七成，奉獻給地主、貴族、皇室享樂。這種農民實際上還是農奴。

（三）不但地主、貴族和皇室依靠剝削農民的地租過活，而且地主階級的國家又強迫農民繳納貢納，並強迫農民從事無價的勞役，去養活一大羣的國家官吏及爲了鎮壓農民之用的軍隊。

（四）保護這種封建剝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如果說周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麼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着封建割據的狀態。在封建國家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絕對的權力，在各地地方分設官職，以掌兵、刑、錢、穀等事，並依地主紳士作爲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

（五）中國歷代的農民，就是在這種封建的經濟剝削和封建的政治壓迫之下，過着貧窮困苦的奴隸式的生活。農民被束縛於封建制度之下，沒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對農民有隨便打罵甚至處死之權，農民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由於地主階級這種殘酷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窮苦和落后，就是中國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才使這個社會內部發生重大的根本的變化，那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及農民的家庭工業；另一方面則促進了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商品的銷售市場，而大量農民及手工業者的破產，又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勞動力的購買市場。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就開始有一部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於新式工業。到了同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就開始了初步的發展。迨至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時期，由於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戰爭，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壓迫，中國民族工業，主要是紡織業、麵粉業和絲織業，曾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不過，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像這樣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恰好相反，它是要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就在它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發生並在相當程度發展過程中，同時還採行了一些阻礙那種發展，或勾結中國封建殘餘以妨阻那種發展的帝國主義政策。那種帝國主義政策展開的過程，也正是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

(一) 由一系列侵略中國的戰役，搶奪去了中國許多屬國和領土，勒索了大宗賠款；依據種種藉口與種種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者有在中國駐紮海陸軍之權，獲有領事裁判權，並把全中國劃分為它們的勢力範圍。

(二) 帝國主義根據條約控制了中國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並把許多通商口岸劃出一部份土地作為它們直接管理的租界。它們控制了中國的海關與對外貿易，控制了中國的交通事業（海上的、陸上的、空中的與內河的）。因此，它們便能使中國的農業生產服從於帝國主義的需要。

(三) 帝國主義還在中國經營了許多輕工業和一部份重工業的企業，以便直接利用中國的原料與廉價的勞動力，並以此與中國的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競爭。

(四) 帝國主義經過借款給中國政府，並在中國開設銀行，壟斷了中國的金融財政。因此，它們就不但在商品競爭上壓倒了中

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而且在金融上財政上扼住了中國的咽喉。

(五) 帝國主義從中國通商都市直至窮鄉僻壤，造成了一個買辦的和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網，造成了爲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階級，以便利其剝削廣大的中國農民。

(六) 爲了造成中國軍閥混戰與鎮壓中國人民的必要，帝國主義曾經供中國政府以大量的軍火與大批的軍事顧問。爲了麻醉中國人民，並使中國知識份子對它服務，帝國主義便以傳教、辦學校、辦報紙和通訊社以及吸引留學生等等方式，來實行其文化侵略政策。

所有這些辦法和步驟，都是帝國主義使中國降爲半殖民地的具體內容。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局勢有了頗大的變化，但那種變化，無論是在日本佔領區，抑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都寧是在由半殖民地向着殖民地轉化，因而，它的半封建特質，就不但沒有減弱，反依種種變相的剝削方式加強了。

(一) 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的深入，自然經濟成分是減少了，或者說，商品貨幣經濟成分是增加了，但因這種變化，不是生產方式革命的結果，而只是買辦性的交換方式擴大的結果，是舶來品加多和農產物被強制變成商品的結果，所以，封建剝削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封建剝削，不但依舊保持着，並還與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結合在一起，仍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佔着顯然的優勢。不但如此，

(二) 抗戰發生後，更原始的殘酷剝削，是通過徵實、徵購、徵兵及其他徭役性的徵工徵伙等方式進行着的。而爲了達成這種各種剝削榨取任務所擴大的封建官僚統治機構，不僅成爲買辦性交換經濟方式擴大的原因，同時也成爲中國各式地主與買辦資本家結成階級聯盟的有力原因。

(三) 經常的戰亂，和由龐大統治機構，龐大財政支出所造成的經常通貨膨脹，對於一切生產事業，對於脆弱的民族資本，儘管

是嚴重的打擊，但對於買辦官僚統治者，對於中國的四大家族及其有關的附隨者，却寧是大發國難財的機會。黃金買賣，外匯管理，生產統制，以及集中國積專賣等等，不論是那種經濟活動方式，都變成了破壞民族資本，擴大買辦官僚資本的有效手段。

(四)買辦官僚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是分不開的。當生產事業商業化，私營企業「官」業化的趨勢，在利用各種機會全面展開的時候，中外的，特別是中美的變相合資經營方式，也在以更大的速度開展着。半封建半殖民的性格，就由此進一步徹底發揮出來了。

這一切，正是中國舊經濟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全般內容，也是我在本書中所企圖剖析的對象。把隱在這個對象後面或裏面的內在聯繫，如實的揭露出來，並由是顯出其發展演變成這種形態的必然的規律，那則是本書原來希望達到的目的。

四

再次，要說明的是，本書的任務，雖然只是在揭露舊經濟內部的矛盾，及其向着毀滅之路邁進的辯證發展規律，但要使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指出其「往何處去」的必然歸宿，或指出其由何種社會經濟形態所代替的必然途徑，是非常必要的。但正因為我的這種研究，不是革命實踐鬥爭過程中的產品，它只是在革命潮流激盪下，在參加革命思想鬥爭影響下的學術研究的產品，或者不妨說是帶有幾分學院式研究的產品，它對於這方面的說明，就顯然是不够充分，不够透澈的事實上，我在本書出版前後，儘管十分堅決的認定封建的買辦官僚的生產關係不革除，中國社會經濟愈來愈陷在萬劫不復的境地。但究竟要用如何的方式，去革除那種生產關係？究竟要用如何的社會經濟方式，去代替那種舊的社會經濟？在長期的社會變動中，無疑是頗費摸索的。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在本書一九四七年生活版序言中，曾坦白表示：「我還不敢對今後中國經濟改造的實行步驟，預先打出一個完整的圖案，」只籠統表明：「今後中國經濟不論採取如何的途徑，它必得針對它當前表現的諸般惡劣傾向，遵循以次三個原

則作去第一，它是必須以生產爲重心的；第二，它是必須採行民主的協作方式的；第三，它是必須進行在社會化基礎之上的。」今日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無疑是在這幾種原則上進行，但是問題顯然不在空泛的指出這些原則，而是在如何具體的去找出實現這些原則的革命步驟。

一切企圖用新的方法，研究中國社會經濟改造的人，要聯繫到實踐，必然會被幾個像是不易連續起來的社會史的問題困擾着：其一，封建生產方式的統治，使我們需要採行破除那種封建統治的資產階級式的民主革命；但其二，處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國資產階級的脆弱性，又不容許成就那種革命，建立資產階級政權；還有其三，即使社會主義已明如觀火的被看作世界一切國家發展的前景，但太落後的社會，又顯然因爲歷史的技術的條件的欠缺，無法逕直由無產階級專政方式，走上那個道路。這個歷史的尷尬場面，使蘇聯出現後的世界許多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要求摸索出一條既適合落後國情，也不違背世界革命潮流的途徑。對於這個途徑的摸索，在許多落後國家，特別是在中國，確實支付了不少血與淚的代價。有一個時期，大家對於民生主義，是存過一些幻想的。民生主義在本身包含有不少矛盾，它與實現它的民權主義政治，根本就不易調和，從歷史上去看，它雖不失爲那種摸索的一個有嘗試性的成果。但在民生主義出現後的三分之一世紀中，在世界，特別在中國，一切情勢是變得太太快了。由於民生主義不會明確指出革命主體與革命對象，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早變成了兩個空洞原則。在大地主與買辦官僚資本聯合專政情勢下，地權愈來愈集中，愈不平均，資本也愈來愈沒有節制。到這時，不徹底消滅地主階級，根本就談不到平均地權；不徹底打倒買辦官僚的四大家族及其幫兇者，根本就談不到節制資本，不消滅地主階級，不倒塌四大家族，也就根本談不到驅除帝國主義勢力。這種革命任務，不是一切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乃至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就無法完成；同時，因爲這種革命的對象，是國內最有權勢的大土地所有者，大買辦官僚資產者，和國外的帝國主義列強，所以，那些被壓迫階級，非好好團結在有最澈底的最大公無私的革命精神的無產階級領導下，也無法完成那種革命任務。不但如此，打倒帝國主義，買辦官僚資本及封建勢力，究還只是破除舊有生產關係，解

放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一面，而新社會經濟關係如何建立起來，得到了解放的社會勞動生產力如何發展起來，那就不僅是革命完成後應當努力的事，同時也實在是革命過程中就必須注意到的事。事實上，不論是農民階級，是小資產階級，抑是民族資產階級，他們都是帶着革命勝利後的展望，而參加到革命隊伍中的，恰好一個落後國家在革命後完成建設的大業，又需要所有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這些階級，都協力組成聯合政體，並在那種政體的保障下，各有發展生產的前途。所以，包羅着這一切革命的與建設的統一原則所構成的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特徵，就在於它明白透澈的看到：只有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方式，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政治形態，才能最有效最迅速的解放並發展我們現存社會的勞動生產力。

如其我們對一種社會經濟改革，是就它是否能解放社會勞動生產力，來測定它是否符合於社會發展的規律，又是就它是否符合於社會發展的規律，來測定它是否出於歷史的必然，那麼，對於混合着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國民黨的買辦官僚統治形態，就因為它在多方面妨礙一般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有理由斷定它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違反歷史必然的。反之，對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或其所採行的社會經濟形態，就不論它在都市方面抑在農村方面，都在儘可能設法增進個別生產者的、國家形態的乃至資本家的生產，那就證示它是符合於社會發展規律，是出於歷史的必然的。由是我們可以明瞭：一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如其說是把社會主義形態當作它的正常發展途徑；一個處在當前國際關係下的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它就必得把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當作它的正常發展途徑。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特殊社會變革條件下產生的新民主主義，已經在今日世界落後而要求變革的一切國家中，變成了一般的世界的革命運動形態。

我們由是才體認到：曾經在中國現代革命運動過程中，多少盡過一些革命號召作用的民生主義，其所以始終不能見之於實行，那與其說是由於它的原則不切合實際，毋寧說是由於它自始就沒有建立起明確的階級立場。一種正確的主義或原則，是同它的階級的革命實踐分不開的。愈到了世界階級對立明朗化、尖銳化，或無產階級勢力日益成長的當前情勢下，不論在那一個國家的社會

變革運動，如其沒有站在堅定的階級立場上，或者忽視了無產階級的主動的領導的作用，那種變革運動便註定是要流產或走到反對方面去的。

中國近數十年來的革命鬥爭歷史，爲我們充分證明了這一真理。

五

總括上面關於中國經濟諸研究階段的補充說明，關於本書研究對象的綜合敘述，以及關於中國舊經濟去向的自我批判的檢討，都無非是想對這個舊著作，多少賦予以新的生命或生氣。而它的所以稱爲解放後的新版，與其說是由於把原來生活版的序文除去了，把原來五篇關於舊經濟學批判的附論（即附論三至附論七）除去了，又加進一篇舊社會生產關係下的諸經濟傾向的總考察（作爲附論三），就不如說是由於這篇新版序言本身，依着這篇新序言，不僅可以見到本書從以前的種種禁制與顛忌解放了，也使本書作者從以前對變革途徑認識不够充分與明確的思想解放了。

一九五〇年二月四日於首都清華園

初版序言

現在拿來與讀者見面的這部書——中國經濟原論，就寫作與出版的過程說，都算是相當難產。

民國二十九年我在國立中山大學擔任高等經濟學這一門課程；顧名思義，當然需要講得高深一點。我於是選定里嘉圖（David Ricardo）所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作為講授的底本。但一半也許因為同學原來所學基礎太差，一半也許因為我自己解說表達的能力不夠，我發現同學對於這門課程感到十分興趣的並不很多。就在同時，我還擔任有中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這兩科。讀中國經濟史的是四年級的同學，讀高等經濟學的亦是四年級的同學。就我平日研究的心得講，我相信我講里嘉圖的經濟學說，還應比講中國經濟史有較大的把握，但同學對後者表示的興奮，却遠較前者為大。我當時就感到這原因，不當完全求之於里嘉圖那部大著的難讀難講，（以謙虛見稱的里嘉圖，當他把那部書拿去問世的時候，他竟表示：全英國是不是會有二十五個人懂得）而更應追問到中國一般研究經濟學的青年學子，在作為一個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的限內，他是否有理解這樣抽象的理論之必要，或者至少，他們所研究的抽象理論，是否能拿來同現實，特別是中國經濟現實發生認識上的關聯。由於這一種感想，我對於中國大學講壇上，關於經濟學以及一切有關經濟學課程所採取的教材與教法，就感到大有改革之必要。我當時所寫的，而放在本書後面作為附論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一文，正是那種意念的具體表現。

在民國三十年，我還是擔任高等經濟學，還是把里嘉圖的經濟學作為底本，不過，每講一章，比如講價值論或地租論，我就把那一章研究的結論，拿來說明中國的商品價值，中國的地租，如何非里嘉圖所研究的範疇，或者里嘉圖所研究的經濟範疇，如何可以從反

面來證示中國社會經濟的非資本主義性。這個講法，馬上使一般同學發生興趣了。研究經濟學或者研究什麼經濟理論，本來是爲了拿來作爲理解或研究現實經濟的手段，但一般却像行所無事的把這種意思弄錯了。

在以後幾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中，我不但在講高等經濟學的時候，丟開了里嘉圖的那部大著，而直接由一般經濟理論，尙論到中國經濟，即分別由價值論展開中國商品價值的研究，由利潤利息論展開中國利潤利息形態的研究，並還把經濟學一門功課也擔任起來，編出一個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研究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綱要，在講完每一篇每一章的一般經濟形態之後，緊接着就講到中國有關經濟形態的相同相異點，以及時下流行的國人有關那種經濟形態的不正確認識，並分別予以評正。刻下，後一部講稿，正由當時負記述責任的一位青年朋友在幫同整理中，而這幾年高等經濟學的講義，則大體是本書的主要構成部分。

本來，在高等經濟學講述的過程中，爲了這樣的講法，這樣的研究法，是一種新的常識，需要分別把它撰述出來，就正於海內的高明，所以，本書第二篇以下直至第八篇，曾分別發表於中山文化季刊、廣東省銀行季刊、時代、中國等雜誌。在民國三十三年初，桂林文化供應社主持人萬民一、萬仲文、昆季的友誼與盛意，使這先後依照一定計劃寫成，但却是分別發表的諸論文，得有集印的機會，於是我會就中國現代經濟的全般發展情形，及中外學者對於中國經濟本身認識的演變情形，寫了一篇長達三萬餘言的緒論，作爲第一篇，而全書則題稱爲中國經濟原論。但事不湊巧，原論的紙版剛好打成，桂林被日寇侵略了。在這以後不久，我亦由國立中山大學的所在地廣東坪石遷到福建來。永安東南出版社計劃印行大學學術叢書，希望我把原來交給文化供應社印行，但却未出版的這部書稿，拿來再印，我當時會函文化供應社的負責人商談，但因交通阻隔，一直沒有回響。我當時設想，爲了文化的意義，另行在東南印行，一定邀得朋友的諒解。況該書的紙版是否搶出還有問題，於是我決計整理舊稿，交由東南出版社印行。但在整理的開始，就發現作爲